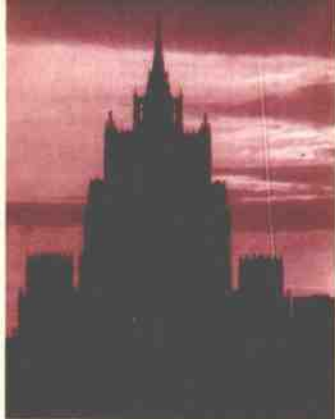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资助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

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

董晓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

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

董晓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教育部 2009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资助
批准号: 09YJA75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对峙与嬗变: 苏联文学发展历史论 / 董晓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60-5792-0

I. ①乌… II. ①董… III. ①文学史—研究—苏联
IV. ①I51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384 号

责任编辑: 胡雅莉

技术编辑: 易平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5 1 插页

字 数 221,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CONTENTS 目录

序一 1

序二 4

前言 17

十月革命至五十年代初：国家乌托邦精神的兴起与衰竭 23

 乌托邦理想主义激情的高扬 25

 伪理想主义的滋生 62

 显在的反乌托邦精神 77

 潜在的反乌托邦精神 103

“解冻”年代：反乌托邦精神的兴盛 127

 反乌托邦精神的高涨 128

国家乌托邦主义的延续	183
后专制主义时代：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精神的转换与变异	190
国家乌托邦主义的转换与变异	191
反乌托邦精神的延续	201
反乌托邦精神的转换与变异	211
改革时期：反乌托邦精神的重新高涨	251
反乌托邦精神的发展与深化	252
国家乌托邦主义的第二次变异	290
结束语	296
主要参考书目	298
后记	300

序 一

杨正润

苏联，这是一个已经消逝了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个不可能再复制的时代。不过在学术史上，这却会是一个长久留存的名字。它只有短短七十多年的历史。一个如此辽阔、如此强大、统治着半个世界的国家却在一瞬间土崩瓦解、分崩离析。它创造了奇迹，也制造了噩梦。如何评价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可能会长久地争论下去，但是谁也不能无视它，或是低估它的存在。

苏联文学就是这个时代的记录。无论从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看，苏联文学都有其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苏联文学又是那么深刻地影响过几代中国人，至今我们仍可看到这种影响难以抹平的痕迹。对苏联文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界的重要课题。现在，我们面前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论著：董晓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看到这标题，再翻阅书中的内容，都有耳目一新之感。

乌托邦是西方一个重要的思想话语，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在历史上长期盛行，作品据说有上千种之多。希腊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意

大利康帕尼拉的《太阳城》，是早期乌托邦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种，都是读者熟悉的。乌托邦意味着遥远而美丽的土地，那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里建立了最符合人性的新秩序。乌托邦体现了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判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渴望。对许多人来说，它甚至成为一种精神的支柱，那位唯美主义的小说家王尔德就说过：“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值一顾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清醒的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部名著《怎么办》中，也设计了一个著名的乌托邦：“维拉的梦”。谁没有做过美丽的梦？“做个好梦”难道不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祝愿？

为了建立世上的乐园，人们进行过种种试验，不过结果总是不那么如意，新鲜之后常又回到老路。于是人们也逐渐产生了一种怀疑：那些乌托邦，就真的那么合理吗？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教主们向听众描绘的蓝图，果真就是人间的天堂？在越来越多的怀疑声中，人们想起了乌托邦（UTOPIA）的拉丁文原意——不存在的地方，它代表了不切实际的空想。这样，“反乌托邦小说”也出现了，在20世纪就有三部代表作品：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它们都在告诉读者：人不能生活在别人给自己设计的乌托邦之中，无论是凭借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是依靠权威的暴力所制造的乌托邦，结果都会带来个性的丧失，结果其实是人类的灾难。

在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那个穷老太婆成为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女王，但到最后又回到在破木盆里洗衣服了，普希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历史比故事当然更复杂。思想家设想了一个乌托邦，革命家去实践并用强力去推行，民众从欢欣鼓舞地接受，到变成怀疑和抗拒，既然是乌托邦，其结果也是可以想见，这就是历史。文学是生活的表征，文学记录了这段缤纷而苦难的历

程：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乌托邦精神（或者说国家乌托邦精神）从兴盛到嬗变，反乌托邦精神兴起，与之交锋和撞击，此消彼长，演绎出波澜壮阔的一幕。有着伟大传统的俄罗斯文学在这里重现了其凝重与深沉。

董晓就是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这场斗争为线索，完整地考察和剖析了苏联文学发展的这一历史轨迹。这在中国学术界还是第一次。

我开始认识董晓的时候，他还是个“阳光男孩”，好玩、好动、善歌、善饮，一转眼功夫他已经在京华拿到博士学位，又回到南方到我这里作博士后了，这本著作就是他博士后工作的一部分，现在终于定稿付印了。记得他留系任教，开始我有点担心：毕竟是在一所老牌大学当教师，讲台下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他活泼的性格，能压得住阵吗？我对他多少要负点责任，于是就向学生打听，结果是颇出意外：学生说他上课一丝不苟，十分严肃，对他甚至有敬畏之感。于是我放心了。读了本书的文稿，我更踏实了：文中的观点留待专家和读者去评价或是争论吧，但是对苏联文学史如此细致的清理和剖析实在非一日之功，在一个如此浮躁和追逐实利的时代，甘守寂寞的年轻学者的不倦追求，他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这才是这部著作中最宝贵的东西。我在这里向他表示敬佩和祝贺。

2007年5月24日 于秦淮河畔

序 二

“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王彬彬

董晓与我，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事。他是俄苏文学的专家，在外国文学教研室，而我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混饭。今日大学的学术体制，使得不同“专业”之间，在“学术”上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对董晓所研究的俄苏文学，我是满怀崇敬的，但也仅有崇敬的资格，若是偶尔在闲谈中也对之说长道短，那一刻一定是不知天高地厚了。然而，前不久，董晓忽然来电话，说他有一本研究苏联文学的专著即将出版，命我写一篇序。这令我大为惶惑。让我为了一本研究苏联文学的专著写序，这不等于是强迫一只乌鸦去指挥百灵唱歌吗？但董晓却说，就是要找一个门外汉来写序。既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写一点门外汉的读后感。

董晓的书，副标题是“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所谓苏联文学，一般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起点，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结束，总共七十来年。董晓在这部专著中，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论述了七十年间，苏联文学中闪光的一面。如果说，苏联文学如同地震后的废墟，那董晓在这部专著中所做的工作，就是从废墟中搜集仍有价值的东西。董晓是满载而归的。董晓所搜集到的，固然在价值上有高

下之别，有的是无价之珍，有的是连城之璧，有的则瑕瑜互见，但都是未可轻率地否定的东西。对于我这个苏联文学的门外汉来说，董晓的书，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我对苏联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心中长期存在的关于苏联文学的某种疑问。

为了能够准确地表达董晓专著的读后感，我应该先说说读前感，即此前对苏联文学的看法。作为一个门外汉，我对苏联文学的印象当然一直是很朦胧和模糊的，但却是一种复杂的朦胧，一种矛盾着的模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文学，我有着强烈的鄙视和憎恶。苏联文学，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学，总体上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一种被极端扭曲了的文学，一种假到极致、空到极致的文学，一种沦为强权之奴仆的文学，一种极其不义极其反人道的文学。而苏联文学，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总体上是负面和消极的。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文学为榜样的，从文学体制到文学观念，都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的。在五十年代，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文学理论乃至关于文学的文件、会议报告和决议，都被译介到中国，成为中国“文学工作者”的“圣经”。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入大学中文系的。去年，潘老师不幸病逝。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后，我坐在他的病床边，与他有过多次对话。一次，他语调平缓地说：“我年轻时就对死不太在意。今年已虚岁七十五了，早超过了年轻时的预期。”停了一会，又说：“我这一生是很努力的，但比起那些真正的大学者，还差得远。”我说：“您这一生，真正用于读书做学问的时间并不多。在您三四十岁的盛年时，遇上了‘文革’，不但耽误了您的时间，更摧毁了您的身体。而在您二三十岁的青年

时期，又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苏联进来的那些垃圾上。”他点点头，黯然无语。潘老师离去后，我在他的书房里随便翻书，书架上仍有着长长的一排上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书籍。我知道，潘老师之所以不肯把这些东西清除掉，并不是因为喜爱，而是因为这些书，每一本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在那个年代，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青年教师，读这些书，是一种“绝对命令”。每顿少吃几口饭来买这些书，是为了以后长期有饭可吃。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蓝英年先生以一系列文章，介绍了苏联作家的荣辱毁誉、生死沉浮。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有《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回眸莫斯科》等多种。这些文章，每一篇谈论的只是一两个作家一两桩事情，但合起来，却生动鲜活地展现了苏联时期文学政策的荒谬，文学环境的严酷以及作家们命运的坎坷、凄惨。例如，在《访法捷耶夫故居》一文中，蓝英年先生告诉我们，从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到1954年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二十年间，有两千多名作家遭到迫害。长期担任作协总书记的法捷耶夫，1956年也满怀悲愤和绝望而自杀。在遗书中，法捷耶夫写道：“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优秀文学人才过早夭亡，余下的多少能创作具有真正价值作品的人，活不到四五十岁。”“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我极其愉快地摆脱这种生活，有如离开向我泼卑鄙、谎言和诽谤脏水的世间。”法捷耶夫参与过对作家的迫害，而他也终于在精神上陷入绝境，可见苏联时期的文学界是

怎样一种可怕和可悲的状况了。

然而，苏联时期的文学，却又不只让人感到可怕和可悲，不只有假、大、空，不只有谎言和欺骗，不只有愚昧和凶残。苏联时期也还有一系列闪光的作家或作品。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曾深深地打动过我；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也已是公认的巨构；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诗感动过、感动着世界上无数的人，并且还将有更多的人被感动；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和随笔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也放射着耀眼的光芒；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有着醉人的艺术魅力；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岛》，也早已蜚声世界、交口称誉了。还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还有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还有……尽管苏联时期的文学界，有着那样多的虚假和丑恶，那样多的污浊和暴戾，但同时也有了这样一些作品，就足以让我对苏联文学也怀有崇敬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有两个苏联时期的作家值得一提。一个是西蒙诺夫，一个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西蒙诺夫也曾是斯大林的红人，也曾在苏联作协中占据高位，一定也做过值得谴责的事情。但他写于卫国战争时期的那首《等着我吧》，却让我始终对他保持着一份敬意。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所谓的“文学青年”时，我读到了这首诗，并且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能够背诵。在后来的岁月里，诗中的一些句子有时会不期然地浮上心头。在幽静的湖边，我会想到这样的诗句：“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勾起你的忧伤满怀，/等到那大雪纷

飞，/等到那酷暑难挨，/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往昔的一切，
一古脑儿抛开。/等到那遥远的他乡/不再有家书传来，/等到一起
等待的人/心灰意懒——都已倦怠。”在喧闹的街头，我会想到这样
的诗句：“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他
们口口声声地说——/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纵然爱子和慈母
认为——/我已不在人间，/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在炉火旁围
坐，/啜饮苦酒，把亡魂追荐……/你可要等下去啊！千万/不要同
他们一起，/忙着举起酒盏。”在飞机上，在火车中，我会想到这样
的诗句：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就让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不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明白——

只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我还记得这首诗的译者叫苏杭。译得是否忠实原文，我自然无从判
断。但就译诗本身来说，可谓是十分高明的。在许多年前，令作为

“文学青年”的我爱不释手的另一种苏联作品，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巴乌斯托夫斯基虽然初衷只是想写一本“创作谈”，但所“谈”的，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写作技巧”范围。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写安徒生的那篇《夜行驿车》。在从威尼斯到维罗纳的夜行驿车上，安徒生以他的善良、幽默和睿智，赢得了同车的几位女性的喜爱。家住维罗纳的一位夫人还深深地爱上了安徒生，同样，爱情也在安徒生的心中滋生。但安徒生为了能继续写出美丽的童话，又一次决定扼杀心中的爱情。在离开维罗纳前，安徒生去了一趟这位夫人的家，是应邀去拜访，也是去辞别。夫人为不能留住安徒生、为自己的爱情得不到回应而流泪。这时，巴乌斯托夫斯基写道：

他扑到她身旁，跪了下来，把脸紧贴在她那双温暖、有力而娇嫩的脚上，她没睁开眼睛，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头，俯下身去，吻了他的嘴唇。

第二颗热泪落到了他的脸上。他闻到泪水的咸味。

“去吧！”她悄声地说。“愿诗神饶恕你的一切。”

他站起身，拿起帽子，匆匆地走了出去。

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最后的那句“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看似平平常常，但却让我感无穷的意味。以至于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为这篇文章取名时，竟自然地想到了这句话。

苏联时期虽然政治对文学有着全方位的侵害，虽然作家们的写作环境那样恶劣，虽然产生了那样多的垃圾，但也毕竟出现了为数

不少的优秀、杰出之作，这原因何在呢？而被认为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却连一部堪与《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媲美的作品都没有呢？——这是长久存在于我心中的疑问。而董晓的专著，某种意义上对这种疑问做出了解答。

董晓认为，在七十来年的苏联文学中，始终存在着乌托邦精神和反乌托邦精神两种力量的对抗。为政治牢牢控制的文学、成为强权之奴隶的文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文学体现的是一种“国家乌托邦精神”。这种“国家乌托邦精神”虽然往往甚嚣尘上、不可一世，但即便在其最猖獗的时候，也未能将每一个苏联作家的每一寸精神空间都置于自己的铁蹄之下。董晓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告诉我们：在七十来年的苏联文学历程中，始终有一部分作家，程度不同地、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创作，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对“国家乌托邦精神”的怀疑、批判与对抗。在《前言》中，董晓指出：“在苏联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乌托邦精神的表现形式都有所不同，而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对抗亦体现出不同的方式。但是，无论乌托邦精神的表现方式在各个历史时期怎样不同，其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以非理性的幻想来取代对现实的理性观照，取代对生活的苦难的审视，在对国家乌托邦精神的依附中丧失了个体对人的苦难与不幸的人道主义关怀。因此，无论作家个人主观动机如何，从客观上讲，这种乌托邦精神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作为人学，作为对现实的形而上的、审美化的否定这一本性。而反乌托邦精神正是体现了文学对其自身本性的追求。”正是因为七十来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一直有着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反乌托邦精神在与乌托邦精神共生着、对抗着，才使得七十来年的苏联文学，不仅仅只有乌托邦精神的垃圾，也有反乌托邦精

神的鲜花在开放、在芬芳；才使得我们仍然不能不对苏联文学怀有一份崇敬。

被认为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相形之下就黯然失色了。在表现乌托邦精神方面，中国当代文学或许毫不逊色，甚至有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表现反乌托邦精神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就望尘莫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常喜欢把中国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相比较，其实二者是既可比又不可比的。在乌托邦精神横行无忌方面，中国当代文学毫无疑问可与苏联文学比较；而在反乌托邦精神始终顽强地存在，并出现许多优秀、杰出作品方面，中国当代文学难以与苏联文学比较。把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所谓“十七年”间文学的凋敝、灾难归咎于苏联文学的影响，固然很有道理，但却必须同时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苏联在乌托邦精神高歌猛进时，仍产生了那些优秀、杰出之作，而同样的事情却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且不说阿赫玛托娃和她的《安魂曲》，也不说布尔加科夫和他的《大师与玛格利特》，更不必说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仅就所谓“军事文学”来说，我们有些什么呢？我们只有《保卫延安》、《红日》、《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七根火柴》这样一些东西。《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与中国当代那些所谓“军事文学”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要求中国当代作家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自己先就难为情了。但我们是连勉强可与《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着我吧》相比较的作品也没有的。这原因何在呢？

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作家是否可能创作出《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着我吧》这样的

作品，这是主观方面。“文革”前十七年间（“文革”期间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文坛是否能容忍这样的作品，这是客观方面。姑且假定在那时期，中国有作家写出了《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着我吧》这样的作品，后果会是怎样呢？首先这样的作品能否以铅字的面目公开问世，就是一个大问题。即便有那种既有眼光又有肝胆的编辑让这种作品公开发表出版，也一定会在问世后遭来杀气腾腾的批判，也一定会让作者惨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第四十一》中，红军女战士虽然最终开枪打死了那名白军士兵，但她毕竟曾经对那名白军士兵生出柔情蜜意，而这在“十七年”期间的中国文坛，是绝对不可以的。作为“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对敌人有丝毫同情、怜悯，何况“爱情”？谁要是胆敢写一点“革命者”对“敌人”的超阶级的情感，那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那就是对“革命者”的污蔑，那就是自身“革命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居然那样浓墨重彩地渲染女战士的身体之美，又为这种美的毁灭而无限哀伤，又视这种美的毁灭为绝大悲剧，——这在“十七年”的中国语境中，也是不可思议的。在“十七年”期间的“军事文学”中，“女性革命者”就意味着“无性革命者”，她们重重包裹着的身体都不能表现，又岂能去表现她们“赤裸裸”的身体之“美”？“十七年”间的“军事文学”，是拒绝悲剧的，以几个“小女子”身体的毁灭来渲染战争的残酷、来表现一种人道情怀，那是近乎“疯狂”之举了。为了“革命”、为了“祖国”、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再大的牺牲都是不足道的，再多生命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几个女性身体的毁灭，那还值得一提？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这样的诗歌，在“十七年”的语境中，也是无法合法地存在的。一个